



第十一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享民生发展

Establishing an All-around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Sharing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on People's Livelihood

主 编/孙壮志
副主编/黄丽娜 谭旭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第十一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享民生发展

Establishing an All-around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Sharing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on People's Livelihood

主 编/孙壮志

副主编/黄丽娜 谭旭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文集编委会

主任：李培林

副主任：陈光金 孙壮志

委员：刁鹏飞 景天魁 李春玲 王春光

王俊秀 王晓毅 吴小英 夏传玲

张翼 赵克斌

秘书：黄丽娜

总 序

我国博士后制度是改革开放以后设立的。1984年5月21日，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借鉴国外的博士后制度，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赞成。1985年，国务院下发文件，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施博士后制度。

我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就是1988年在北京大学设立的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首任所长费孝通先生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则成立于1999年。1999年至今，10多年过去了，已经招收了近百名博士后，他们多数都已经出站，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实践证明，中国博士后制度对于选拔、培养优秀人才，促进人才流动，创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此后，举办这个论坛成为一项制度，坚持每年举办一次，至今已先后在北京、武汉、厦门、沈阳、重庆等地成功举办了十届。与我国其他文科博士后流动站的论坛相比，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有这样几个特色。

第一，参加人员的广泛性。参加论坛的，既不限于在站的博士后，已经出站的博士后参加论坛的热情也很高；也不限于本站的博士后，其他高校的社会学博士后也有不少人参加；还限于社会学的博士后，其他学科的博士后往往也来参加；而且不限于博士后，博士后的合作导师也满怀兴趣地参加。这样就使这个论坛成为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

第二，论坛会上会下交流方式多样。这个论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为依托，联谊会还设立了地区分会，他们积极参与论坛的组织工作，除了邀请著名学者发表主题演讲、组织专题分论坛之外，还组织会下

的讨论会和会后的社会调查。很多博士后反映，通过这个论坛活动，所有的博士后都能够不站站内站外，不分学科专业背景，充分深入地交流，并能发现很多平时自己本学科容易忽略的问题，扩大了自己的学科知识面，同一个社会问题可以得到不同学科视角的诠释和理解。

第三，学术成果丰硕。论坛参加者以文入选，要提交合乎学术规范的高质量学术论文，而且论文的题目要贴近论坛的主题。而论坛的主题，往往是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样，每年论坛之后，都有一批高质量的涉及社会发展重大现实问题的博士后学术论文，我们选择其中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就形成现在这个社会学博士后论文集的系列。我们希望再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个论文集系列，能够记载我国的巨大社会变迁，也记载社会学博士后的学术足迹。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要处理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社会问题开始凸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要处理的一个新的核心议题。在这个核心议题的探索中，社会学承担着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和研究重任。但愿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的这个论文集系列，也能为担当这一学术使命贡献一份力量。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部分 社会管理体制转型与创新

- 贫困问题的根源、治理经验及公共政策选择 孟翔飞 / 3
- 试论我国慈善监管的转型 陈为雷 / 22
- 调适与整合：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探索
——基于新疆 M 村的调查研究 赵 茜 / 40

第二部分 基层社会治理

- 话语促成的“共谋”：以北京市城中村拆迁为例 刘怡然 / 57
- 产权的不完全转移：地权流转的一个分析框架 王庆明 / 78
- “逆城镇化”背景下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研究
——以大理“新移民”为例 张 慧 / 90

第三部分 文化变迁与传承

- 影视传播与族群文化发展
——以边境少数民族村寨生活文化塑形为例 彭流莹 / 111
- 以《双伯郎》《关公祭刀》论石邮傩神的宗族化 黄清喜 / 125
- 论“孝”的起源、演变及其当代转化 杨建海 / 138

第四部分 基于群体视角的社会治理

- 个案工作对出狱女犯的介入研究 艾 晶 / 151

农民工收入水平代际流动主观评价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504 份问卷数据的分析 陈旭峰 / 164

追寻认同

——国家-社会关系转变与慈善公信力的重建 刘 威 / 177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距离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研究 史 斌 / 192

农村留守妇女对生态权益的认知与维权表现

——基于豫西五村的调研分析 李全喜 王云航 / 207

Tables of Contents & Abstracts / 219

**第一部分 社会管理体制
转型与创新**

贫困问题的根源、治理经验 及公共政策选择

孟翔飞

摘要：贫困问题既是一个历史性的沉重话题，又是一个时代性的复杂问题。其问题具有复杂性，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治理经验亦呈多元性。本文通过追溯贫困问题产生的复杂根源，比较差异化的国际治理经验，提出了贫困治理的系统化政策：调整分配政策，积极扩大中产阶级规模；进行“精准”与造血式扶贫；建立多元化治理模式；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泛城市化”的城乡一体化；建设专门的金融支持体系；构筑“分享”的社会文化。

关键词：贫困 贫困治理 贫困线 公共政策选择

一 贫困问题的根源

（一）关于贫困的界定

贫困从来就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它是人类文明所面临的痼疾，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一直未曾消失。什么是“贫困”？通常依据家庭收入来定义贫困，如收入低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平均收入，或生活费用介于一天1美元和2美元之间的水平。然而，这种定义并不能反映出贫困的多维性。人们的贫困不仅是因为收入低，还可能来自不够充足、稳定或危险的社会境地。比如，住房过度拥挤、质量差或不安全；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缺乏

必要的卫生环境或教育；缺少安全的社会环境；公民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和传统权利受到歧视，得不到法律规范的保护等（联合国人居署，2006：35~36）。因此，贫困的定义既可以是绝对的，又可以是相对的。前者“指向绝对的物质匮乏或不平等”（杨立雄、谢丹丹，2007）。后者则指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意味着遭受社会排斥或者剥夺。资源决定了人们获得正常社会生活水平的条件以及参与正常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穷人缺少足够的资源，他们所应拥有的条件和机会被相对剥夺，从而处于贫困状态，即相对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在任何阶级社会都会存在。

与贫困概念相对应，贫困识别也体现出多元性。通用的贫困识别理论包括绝对贫困线、相对贫困线、主观贫困线和其他贫困线制定理论。其中，绝对贫困线测量方法包括预算标准法、食物支出份额法、马丁法和食物-能量摄取法。相对贫困线测量方法包括预算标准法、社会指标法、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法和收入法。主观贫困线测量方法是指通过问卷方法制定主观贫困线来测量贫困状况。其他贫困线测量方法是指通过混合贫困线和国际贫困线两种贫困线的制定来测量贫困状况（池振合、杨宜勇，2012）。

上述研究代表着研究者不同的侧重及价值取向，比如绝对贫困线测量方法中预算标准法关注贫困人群的基本生存消费价格，食物支出份额法关注食物总支出份额，食物-能量摄取法关注收入与人体能力摄入的关系。而相对贫困线测量方法则更关注以社会公认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水平作为划定贫困与否的界限。主观贫困线测量方法通过了解群体成员对自身福利情况来划定贫困线。而混合贫困线测量方法则瞄准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理论所存在的弱点，通过技术性调整，一方面解决绝对贫困线测量方法无法反馈维持人基本需求的标准在不同社会不同阶段或同一社会不同阶段的差异性问题，另一方面排除相对贫困线测量方法中包含的过多人为因素。国际贫困线测量方法则是作为测算全球贫困人口而使用的贫困线测量方法，这里所使用的是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贫困标准。虽然这种方法的科学性有待考量，但是它因为简单易行而被广泛使用。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10月份发布的报告，最新国际贫困线为每天1.90美元。

（二）穷人为什么会穷

历史地看，造成穷困生活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既有社会（包括社会结构）因素，又有个体因素。随着社会高度城市化，经济社会形态变化，贫困的原因会越来越呈现多样性。

1. 社会不公平

目前，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平和某些地区持续性的贫困问题严肃地提醒着人们：“即使是现在，减贫已经成为国际政策议程的重要议题且各国政府都通过各种方案治理贫困，贫困和不平等仍被证明是极为棘手的难题。”（郭烁，2011）社会不公平可以被视为现阶段大多数国家贫困存在的根本原因。无论在超级大国美国，还是在发展中的南非，权力、财富以及其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都加剧着贫富差距，禁锢着贫困人群摆脱贫困的希望。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最富有的 10% 的人口不再是拿走全部收入的 1/3，而是拿走了一半。过去，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水平大约是普通工人的 20 倍至 30 倍，如今已高达 273 倍。”（廖政军，2014）美国经济学家们普遍担忧，低产和中产阶级在资源分配上的无能为力，拉大了其与少数富贵阶层的消费差距，使其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而股市中占美国人口 10% 的富人掌控其中 80% 的财富则意味着，股市收益仍将被富人专享，并侵蚀正在好转的美国经济。华盛顿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马克·兰克在其《美国贫困成主流》一文中提到：贫困终究是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失败的结果，大多并非个人原因造成。他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贫困已成为美国的主流，而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问题不是我们是否会经历贫困，而是何时经历”（廖政军，2014）。

在南非，目前为穷人创造的就业机会大多是低技能、低薪水的岗位，这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穷人的经济地位。在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对比强烈的画面形象地诠释着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在城市的北部迪普思卢特黑人贫民窟的只有 8.8 平方公里的区域里“蜗居”着近 35 万人口，一间 16 平方米的房子挤住着 5 个人，一间公用厕所由 70 人共用。而从这里向南驱车不到 10 分钟，即到达南非有名的高尔夫球场社区。在这里，家家都是独门独户的别墅；小区里，高尔夫球场、游泳池、网球场、足球场、俱乐部一应俱全；一条小溪穿过社区，风景宜人（倪涛，2015）。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其《不平等现象在所有层面增多》一文中指出：“在 19 世纪自由主义及其后来的追随者看来，既然市场由竞争所决定，那么每个经济参与者的收入与其各自的社会贡献有关——经济学家将其称为‘边际产品’。”（约瑟夫·施蒂格利茨，2016）然而“银行向领导层成员发放巨额分红，而这些人却引领企业走向破产并令经济走向崩溃边缘，说到底，这很难和给一个人的报酬与其

社会贡献存在一定关系的信念统一起来”。因此，我们的判断是“很多关于市场经济学的假说都建立在承认竞争模式的基础上，承认在该模式下边际收益与社会贡献相符。这个视角导致了公共部门对于干预犹豫不决：如果市场本质上是有效和公平的，那么即便是最好的政府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但是如果市场是在剥削基础上的，那么政界不干预的理由就消失了。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与当权派势力的斗争不仅仅是为了民主的斗争，也是一场提高效率和共同富裕的斗争”。

2. 工业变革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指出，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机器“剥夺”了手工业者和自耕农、佃农们的生计，迫使他们背井离乡，拖家带口，来到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小工业创造了中间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小中间阶级已经被工业摧毁，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分化出贫穷的工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406）

尽管现代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不一定赞成恩格斯的理论，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贫困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集聚的直接原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交互影响。农村人口为了更高的收入，参与到工业体系中，他们中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更好、更加自由的城市文明逐渐地来到城市。然而，面对工种限制、流动就业成本高、福利保障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催生作用下，这群农民工兄弟很大一部分成了城市贫困阶级。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在1997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以后，大城市贫困人口（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第二、三类人员迅速增多，成为贫困人口的主体（魏津生，2013）。相对于传统的城市贫困人口，经济市场化转轨造成的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农村流动人口中的贫困人口被统称为城市“新贫困人口”。

3. 资源诅咒

资源，无论上天的恩赐，还是祖辈的基业，都是就特定人群而言的。就经济发展而言，获得资源就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但世间万物，“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凡事，有利就有弊。“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1993年，英国学者 Richard M. Auty 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理论，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相反是一种限制。类似辽宁抚顺、本溪、

阜新等资源型城市经济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从事”的是曾经的朝阳产业，而这些产业现在已经成为夕阳产业。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篇就写道：“我们的工业文明正处在十字路口。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生活方式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正日渐枯竭，那些靠化石燃料驱动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也运转乏力。”（杰里米·里夫金，2013：序言）传统工业模式的衰退给以其为生存条件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电影《钢的琴》就是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一个剪影。主人公陈桂林原是东北一家国有钢铁企业的工人，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他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下岗了。幸好，他会拉手风琴，在与几个下岗同事商量后，他们建了一个草台班子，靠红白喜事中的零活养家糊口。艰难的日子中，他的妻子跟一个卖假药的商人离家出走了，在他与妻子争夺女儿抚养权时，女儿提出谁能给她买架钢琴就跟谁。为了获得女儿的抚养权，这位下岗失业的父亲踏上了用钢铁艰辛造琴的路程。

电影中的陈桂林代表着曾经令中国人骄傲的工人阶级，他们工资较高、受人尊重、技术过硬，为中国经济的腾飞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一场企业改革把正值壮年的他们抛向了社会，使他们重新回到了工作的起点。同时，记录他们光辉岁月的厂房、机器被废弃、荒芜，电影中那两个象征产能和效益的烟囱更是在爆破中灰飞烟灭，他们精湛的技术和无穷的创造力顿时失去了用武之地。正如陈桂林所言：本来是要像桂林山水一样甲天下的，却成了一个夹生的人。

4. 贫困文化

贫困文化是指穷人共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这一思想是由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在对墨西哥贫民窟居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也是全世界许多城市穷人的共同点。刘易斯认为，当几代人都经受经济剥夺之苦时，就会产生一种适应这种剥夺的文化，从而克服贫困的极端环境。这种文化的特点包括：屈从意识、怀疑权威、无规划或没有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这种文化代际相传，子孙后代都接受了这种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态度，从而从心理上不能充分利用一生中可能出现的变化条件或者增长机会。贫困文化的概念对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反贫困社会计划有着重要影响。这些计划中有许多是旨在改变穷人的个人素质（包括文化价值观）的，以使它们能更有效地参与职业市场的竞争。

5. 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理论被应用于贫困研究，最早起源于英国学者 Townsen 等人提出的“社会剥夺”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概念进一步发展成社会排斥理论和社会排斥分析框架，它们主要用来研究失业、贫困、两极分化等问题（唐丽霞、李小云、左停，2010）。曾群和魏雁滨曾对有关排斥维度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社会排斥可以分为经济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和社会福利排斥等。多层次的不利因素使社会的贫困人群，陷入缺乏维持最低标准生活的能力，进而被排斥出主流社会（曾群、魏雁滨，2004）。

很多人认为，全球化与经济发展能够消解这种隔阂。但事实恰恰相反，城市社区的标签化作用越来越凸显。尽管各国政府都在努力消除人们对贫民区的歧视，但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媒体和消费者的利益与行动的结合产生了“门禁机器”（Gating Machine），隔离社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并且没有改善的迹象。由此，贫民区与社会排斥的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贫困陷阱”——进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6. 个人因素

富兰克林曾说：“贫穷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以为命中注定贫穷或一定老死于贫穷的思想。”“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人们经常用因果来解释富贵贫贱。穷人贫穷的原因中其个人因素也不容小觑。在美国，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穷人应该对他们自己的不幸负责。按照这个观点——被社会科学家通常称为“责怪受害者”的例子——任何人都有通过努力工作得到发展的同样的机会。如果一个人贫穷，那么他个人肯定在某方面不成功。

（三）关注贫困

对于贫困的帮扶与否，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声音。一方面，认为社会不幸和贫困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贫困的责任不在社会而在个人，因而不应进行救济，特别是不应进行公共援助，比如早期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在经济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下曾形成的观点。另一方面，则认为关注贫困是人类的基本道德要求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弱势群体应该充满同情和关爱，并努力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

纵观我国历史，反贫济贫的思想和实践比比皆是。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等都提出过许多蕴含着丰富的关注社会贫困弱势群体的思想主张，其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提出了“仁莫大于爱人”

的观点，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西周及汉代通过奖励物资、定期减免赋税来消除丧失劳动能力人群的后顾之忧。宋元时代及以后，开办“经济广场”“惠民药房”广济穷人。我国具备悠久的救济贫困人群传统，具备强烈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具备消除社会冲突、追求社会和谐和强烈的愿望。在当今社会，政府的社会保障建设及各种慈善组织、非政府组织（NGO）、民间组织、爱心人士的涌现，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全社会支持网络，这一网络正是这些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发展追求的延续和体现。由此可见，对待贫困，我们不能漠视，不能被动，而应积极主动，有所作为，因为这既是良知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共荣的必经之路。

习近平高度重视反贫困工作，1992年即出版了《摆脱贫困》一书。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把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要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不能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的情况。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深刻指出：“决不能让老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让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这是我们党的历史责任。”

二 国际治贫经验和教训

贫困与治贫一直相生相伴，无论福利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想方设法解决贫困这一重大问题。纵观世界多国的治贫历程，英国的福利国家模式、美国的“补充型”社会保障模式、新加坡的“私有化”社会保障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最具示范意义的治贫经验，将为我国的扶贫攻坚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一）英国的福利国家模式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救助制度的国家，并形成了社会救助制度的“英国典范”。英国的福利制度始于1536年颁布的《亨利济贫法》，当时，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瓦解，让大批的失地农民、无业工人流离失所，原有的宗教机构、慈善机构救助乏力，政府开始主动介入贫困问题

的解决上来，“法令规定：地方官员有义务分发教会收集的支援捐赠物资，用来救济穷人、残疾人、病人和老年人。允许地方公共基金为身体健康、能够从事工作的人们提供工作”（庄园，2009：13）。1601年，英国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标志着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则为英国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贝弗里奇报告》指出，贫困、无知、疾病、肮脏和懒惰是抑制英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五大障碍，国家要采取措施解决上述问题。”（国际司，2013）在贝弗里奇思想的指导下，英国相继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家庭补助法》《国民救济法》《教育法》《老年年金保险法》《失业保险与健康保险法》《妇女儿童福利法》《寡妇孤儿及老年年金法》《国民健康保险法》《家庭津贴法》《失业法》等一系列法律，最终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最完备的国家。完善的社会法律制度使英国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化和对公民保障权利的全面保障，从而成为社会的“减震器”和“稳定器”，构成了一个社会安全网，起到稳定社会、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由于福利支出越来越多，福利收支不平衡，公共财政负担开始加重。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持续萎缩、失业人口不断增加，企业不愿投资，而社会福利优厚；再加之国有企业垄断、庞大的工会势力以至影响社会运作，英国染上了著名的“英国病”，也催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个56岁的英国男子菲利波特，一辈子几乎没有工作过，和老婆及情妇一起生了17个孩子，一直都是靠相关的社会福利过日子。他非常精明，利用英国福利制度的各种弊端和漏洞，从这个体系中每年得到了近7万英镑。而对一个正常纳税人来说，要得到这样的纯收入，每年的税前工资必须超过10万英镑，这在英国属于收入最高的2%。2012年5月，因为情妇要把5个孩子带走，将导致他们的福利金大减，菲利波特夫妇决定纵火烧屋，并嫁祸给前女友。结果害人不成，却导致6个孩子活活被烧死。最近，这对夫妇被判处无期徒刑。”（赵灵敏，2013）

为了重振英国国力，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一方面通过私有化，压制工会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力削减福利开支。例如“改革之前，国民保险基金提供居民的疾病津贴。1982年的社会保障法打破了这种传统，该法规定，病人最初8周疾病津贴的责任由雇主承担，雇主的这一部分支出可以从国家给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险税率减免等优惠中获得补偿”（黄卫邦，2015：12）。